
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实验经济学的视角

周业安 左聪颖 袁晓燕*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采用相对较为合理的实验结构,在经济学框架下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与国外大多数研究发现男女偏好在这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是,中国被试对于风险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偏好方面的差异也比较小,并且男性风险中性个体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男性中自私的个体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我们还同时对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其他一些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结论,如经济学专业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和利他偏好等。

关键词 社会偏好 偏好的性别差异 实验经济学

一 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性别差异的兴趣主要在于性别不平等的视角,无论是机会还是结果层面等性别差异均被视为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导致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歧视。Blau 和 Kahn(2000)发现,男女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差异除了表现在消费和投资上,更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距以及雇佣差异等方面。事实上,全

* 周业安、左聪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00872;袁晓燕: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710062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043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偏好理论与社会合作机制研究”(12BJL039)、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及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受教育程度、劳动时间配置及城镇女性福利水平比较”及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性别差异的行为及实验经济学研究”(11SZYB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以上项目的支持。当然,文责自负。

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收入都低于男性(Lloyd 和 Beth,1979)。Werner 和 Ward(2004)发现性别工资差距主要由行业差异、职业差异以及职位差异等引起。Weinberg(2005)甚至还发现,当女性进入企业高层后,男女高管的性别收入差距居然高达30%。上述研究都从性别歧视这个视角揭示了男女性别差异,但迄今这些研究忽视或者轻视了除身体禀赋之外的非歧视因素,特别是内在于个体偏好层面的差异本身。也就是说,看似机会和结果上的性别不平等可能有一部分不是歧视所带来的,而是内在的偏好差异引致的。大量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男女两性在偏好上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如女性通常比男性要更加厌恶风险,女性要比男性更具社会导向(无私),男性则更具个体导向(自私)。^①不过,人的偏好微观结构比较复杂,究竟哪些类型的偏好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性别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支持。

迄今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偏好具有异质性,且偏好的微观结构呈多样化色彩。Binswanger(1980)、Andreoni(1988)、Frey 和 Bohnet(1995)、Berg 等(1995)以及 Bolton 和 Zwick(1995)的研究表明,个体偏好微观结构展示出复杂多样性,不仅具有自利偏好和风险偏好,还存在互惠和利他等社会偏好;而就其中的风险和社会偏好而言,又体现出异质性的一面。^②其中,这种异质性的重要表现就是性别差异。^③

但就现有研究成果看,相关证据并不一致。一些人认为可能是文化或环境所致;而另一些人认为是框架效应所致,即男性和女性对不同实验框架或结构反应的不同会影响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Croson 和 Gneezy,2009)。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理论和证据上的分歧,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检验。通常认为,东西方文化存在显著差异,而现有的关于偏好性别差异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被试,缺乏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证据。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就国内现有研究来说,虽然相关实验经济学研究证据已经揭示了偏好的异质性,^④但并没有对个体在偏好上的性别差异做出进一步研究,而这恰恰是本文的研究重点。^⑤本文试图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以中国国内

① Byrnes 等(1999)与 Arch(1993)对风险偏好方面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综述;Eckel 和 Grossman(1998)对社会性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综述。

② 社会偏好具体可以细分为利他偏好(Andreoni 和 Miller,2002)、不平等厌恶偏好(Fehr 和 Schmidt,1999)以及互惠偏好(Rabin,1993)。

③ 有关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综述可以参见 Eckel 和 Grossman(2008a)与 Croson 和 Gneezy(2009)。

④ 如周业安和宋紫峰(2008)、陈叶烽(2010)以及周业安等(2012)。

⑤ 虽然 Gong 和 Yang(2012)与 Gong 等(2010)对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个体的风险偏好和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具有一般性,本文则以国内更为一般化的个体为研究对象,对国内个体的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

个体为被试,采用较为合理的实验结构测度个体的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以期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一个系统研究。^①

本文如 Croson 和 Gneezy(2009)所言,可以为消费、投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现实的性别差异提供不同理论解释;而且还可以为偏好微观结构及偏好异质性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由此可以丰富经济学对于偏好的理解。同时,本文也试图弥补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和国外已有研究结果形成对比,为分析文化对个体偏好性别差异结果的影响提供来自中国的实验证据。性别差异是一种重要且普遍的社会现象,如何弱化和消除性别不平等是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该方面政策设计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描述实验设计;第四部分分析实验结果;第五部分为本文结论。

二 文献综述

在非经济学框架下,社会学和心理学已经对个体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到的基础研究结论表明,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更具社会导向。那么在包含货币激励的经济学框架下,个体在偏好上是否也会展现出显著差异,实验经济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集中在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两方面。

(一) 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

根据 Eckel 和 Grossman(2008a)对风险偏好的研究综述,主要分为抽象博彩实验、包含具体背景的博彩实验以及现场实验研究。来自于抽象博彩实验的大多数研究结果都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如 Schubert 等(1999)、Holt 和 Laury(2002)、Har-
togh 等(2002)、Eckel 和 Grossman(2002、2008b)、Eriksson 和 Simpson(2010)以及 Booth 和 Nolen(2012)等,但也有少数部分研究表明,风险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如 Harbaugh 等(2002)与 Moore 和 Eckel(2003),而来自包含具体背景和现场实验的研究结果则没有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这些研究大多以投资、保险等金融市场决策为背景,如 Powell 和 Ansic(1997)、Eckel 和 Grossman(2002、2008b)以及 Dreber 等(2010)的研

^① 在本文中,我们同时对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这两种类型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不仅是因为这两种类型偏好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这两种类型偏好可能存在的内在关系,即具有更高风险厌恶程度的个体也可能具有更高的社会偏好,如 Vickerey(1945)与 Harsanyi(1955)早就指出,个体的不平等厌恶实质上就是对未来收入和地位等不确定性的担忧等。本文对社会偏好性别差异的研究,将在控制个体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进行,这不仅可以探讨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关系,并且如果风险偏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也可以试图分析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与风险偏好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

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而 Schubert 等(1999)、Gysler 等(2002)以及 Gneezy 等(2009)的研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Moore 和 Eckel(2003)则发现风险偏好和框架性质有关,在得益框架下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损失框架下两者无差异。同样,现场实验研究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如 Bernasek 和 Shwiff(2001)、Barber 和 Odean(2001)、Harris 等(2006)以及 Arano 等(2010)。

除了上述框架效应对偏好性别差异的影响外,文化或环境的差异也可能是诱因之一。Zinkhan 和 Karande(1991)研究了美国与西班牙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发现虽然美国个体更厌恶风险,但是在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上两个国家并没有展现出文化差异;Cárdenas 等(2012)分别对瑞士和哥伦比亚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并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其研究表明,瑞士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要低于哥伦比亚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程度是风险偏好性别差异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Booth 和 Nolen(2012)分别对来自单性别学校和双性别混合学校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并对两者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来自双性别混合学校的个体风险偏好存在性别差异,而来自不同单性别学校个体的风险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同样说明环境对风险偏好性别差异的影响;Gong 和 Yang(2012)分别对中国云南母系摩梭和父权制少数民族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并对两者进行对比,其研究表明,两者中的个体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要更加厌恶风险,但母系摩梭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化或环境对个体风险偏好性别差异程度的影响。

(二) 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

社会偏好主要分为利他偏好、不平等厌恶偏好以及互惠偏好。Eckel 和 Grossman(1998)、Dickinson 和 Tiefenthaler(2002)、Dufwenberg 和 Muren(2006a)、Rigdon 等(2009)以及 Dreber 等(2012)认为,女性要比男性具有更强的利他偏好,但 Bolton 和 Katok(1995)与 Dufwenberg 和 Muren(2006b)的研究没有发现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在对最后通牒博弈中响应者的拒绝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中,Eckel 和 Grossman(2001)认为,与女性相比男性具有更低的不平等厌恶偏好,而 Solnick(2001)与 García-Gallego 等(2012)则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女性更加厌恶不平等;Carlsson 等(2005)采用基于个体对不同社会的偏好实验测度了个体不平等厌恶系数,测定结果同样表明女性要比男性具有更高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在对信任博弈代理人互惠行为的研究中,实验研究对个体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差异。Croson 和 Buchan(1999)、Chaudhuri 和 Gangadharan(2007)、Buchan 等(2008)以及 Schwioren 和 Sutter

(2008)的研究表明女性在互惠偏好上要强于男性,而 Eckel 和 Wilson(2004a、b)、Cox 和 Deck(2006)以及 Bohnet(2007)研究并没有发现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并且 Bellemare 和 Kröger(2007)还发现男性的互惠偏好要强于女性;Clark 和 Sefton(2001)则在序贯囚徒困境博弈下也同样没有发现互惠偏好的显著性别差异;而 Heinz 等(2012)在修正的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对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互惠偏好要更强。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同样可能是文化或环境差异以及框架效应带来的,如 Gong 等(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母系摩梭男性的利他偏好要强于女性,而父权制个体的利他偏好则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化或环境对个体利他偏好性别差异的影响。

既然对偏好性别差异的实验研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并且文化差异是可能导致不同研究结果差异的潜在原因,那么国内个体在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上是否会展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国内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虽然 Gong 等(2010)与 Gong 和 Yang(2012)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其研究对象仅限于云南两个少数民族个体,不具有一般性,其研究结果也很难和国外相关研究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内更为一般化的个体为样本,在采用相对较为合理的实验框架基础上,详细测度个体风险偏好和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偏好,在经济学框架下对个体的风险偏好和三种不同类型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系统地研究。^①

三 实验设计

本文所有实验分为不同时间段或场次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实验室以及浙江大学计算中心完成,每个场次的实验都包括风险偏好、不平等厌恶偏好、利他偏好以及互惠偏好的测度实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共 304 名学生被试参加了所有的偏好测度实验。^② 通

^① 与现有大多数研究所不同的是,我们一方面在研究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时,对个体的其他一些客观特征进行了控制;另一方面在研究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时,对个体的风险偏好进行了控制,并且对不平等厌恶和互惠偏好性别差异的研究是建立在详细测度出个体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和互惠偏好系数的基础上进行的。

^② 其中,我们于 2012 年 6 月 2 日、11 月 17 日和 18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实验室进行了 6 个场次的实验,共 148 名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被试参加了实验;于 2012 年 6 月 3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实验室进行了 2 个场次的实验,共 48 名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被试参加了实验;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和 16 日,在浙江大学计算中心进行了 4 个场次的实验;共 108 名来自于浙江大学的被试参加了实验。本文每场实验平均耗时 1 小时,被试的平均收益为 33 元。

过 Z-tree 软件 (Fischbacher, 2007) 编制实验程序, 被试的所有操作都在计算机上完成。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匿名的, 被试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同时实验过程采用真实的货币激励, 被试的最终收益由出场费和被试根据其在实验中的决策所获得的收益两部分构成。除了正式的测度实验, 被试要参加问卷调查和实验问题测试部分, 以获取被试的个体特征信息, 如性别等以及检验被试是否理解了实验支付规则。^① 具体测度实验如下:

(一) 风险偏好的测度: 本文采用 Holt 和 Laury (2002) 的风险偏好测度方法, 基于标准的 Arrow-Pratt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计算风险偏好, 该实验设计因为其广泛的应用和外部有效性, 被看做是有关风险偏好测度文献中的“黄金标准”。被试在实验中需要在 10 对彩票中对每 1 对彩票做出选择彩票 A 还是选择彩票 B 的决定, 其中所有 10 对彩票中, 彩票 A 的高低收益都为 2 元和 1.6 元, 彩票 B 的收益都为 3.85 元和 0.1 元, 从第 1 对彩票到第 10 对彩票, 彩票 A 和彩票 B 的高收益概率由 1/10 逐步增加到 10/10, 而低收益的概率由 9/10 逐步递减到 0/10。被试选择结束后随机抽取 1 对彩票, 并根据被试在该对彩票的选择进行抽奖以决定被试的收益。其中彩票 A 相对于彩票 B 被称为安全选项, 最终可以根据被试选择安全选项的个数来计算被试的风险厌恶系数的一个区间。被试选择安全选项的个数越多, 代表其风险厌恶程度越高。

(二) 不平等厌恶的测度: 本文以 Fehr 和 Schmidt (1999) 的不平等厌恶理论模型为基础, 即 $U(x) = x^{1-r}/(1-r)$, 该模型将不平等厌恶划分为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并采用 Dannenberg 等 (2007) 修正的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设计, 该设计能够测度出被试相对较为纯粹的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在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 两位被试分为一组, 每位被试需要在 22 对分配方案中对每 1 对分配方案做出选择分配方案 1 还是分配方案 2 的决定, 以决定自己和对方的收益。劣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 22 对分配方案中的分配方案 2 都为 (2, 2), 分别表示被试自己的收益以及对方的收益, 而从第 1 ~ 22 对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 1 中被试自己的收益从 5 逐渐下降至 0.1, 而对方的收益则从 5 逐渐增加至 9.9, 但分配方案 1 中的收益总和为 10。在优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 22 对分配方案中的分配方案 1 都是 (10, 0), 同样表示被试自己的收益以及对方的收益, 而从第 1 ~ 22 对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 2 中被试自己的收益和对方的收益都相同, 从 (0, 0) 逐步增加至 (10.5, 10.5)。在实验结束后, 电脑将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实验和其中的一个分配方案, 并选择每组其中一位被试, 根据其在该分配方案下

^① 为了控制顺序效应和财富效应, 在不同的场次中, 我们采用了不同的实验进行顺序, 并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都没有任何的反馈信息。

的选择来决定自己和对方的收益。在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分配方案 2 相对于分配方案 1,被称为平均收益方案,最终可以根据被试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或被试由分配方案 1 转向选择分配方案 2 的转折点来计算被试的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的一个区间。被试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越多,代表其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①

(三)利他偏好的测度:对于利他偏好的测度通常采用独裁者博弈实验,本文采用了带策略性方法的独裁者博弈,在实验中两人分成一组,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一开始将共同获得 10 个筹码,其中由角色 A 来决定如何在双方之间做出分配,角色 B 只能接受。但一开始并不确定双方到底谁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要同时扮演角色 A,做出如下决策:如果你为角色 A,对方为角色 B 时,你愿意分配给对方的筹码数额? 决策结束后电脑将随机决定双方谁最终扮演角色 A,并由该位被试的分配决策来决定双方的收益。该试验只进行一轮,实验收益将以 1 单位筹码兑换成 1 元的兑换比率兑换成现金支付给被试。该实验设计能够更好地剔除声誉效应的影响,测度出更为纯粹的利他偏好。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可以通过被试在作为角色 A 时分配给对方的数额来度量其利他偏好的程度。

(四)互惠偏好的测度:信任博弈实验为测度个体的互惠偏好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本文同样采用带策略性方法的信任博弈设计,该设计能够更好地在控制对方投资额的情况下测度个体的互惠偏好。我们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方法来计算个体的互惠偏好系数。在实验中两人分成一组,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一开始都将分别获得 10 个筹码,角色 A 可以将 10 个筹码中的任何数额投资给角色 B,角色 B 将相应获得一个 3 倍于该投资额的收益,随后角色 B 需要做出愿意返还给角色 A 的数额,返还额可以是介于 0 和投资收益之间的任何数额。同样一开始并不决定双方到底谁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要同时先后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 做出如下决策:1. 如果你为角色 A,对方为角色 B,你愿意投资给对方的数额? 2. 如果你作为角色 B,对方作为角色 A,在角色 A 的 0 到 10 个筹码之间的各个可能的投资数额下,你相应获得 3 倍的投资收益,你愿意返还给对方的数额(在 10 种可能的投资额下分别做出返还决策)。除了以上两项决策,被试还需要完成一项预期决策。决策结束后,电脑将最终随机决定双方到底谁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并根据扮演角色 A 的被试在决策 1 中的投资额以及扮演角色 B 的被试在决策 2 中,面对该投资额的返还额来

^① 该实验设计能够很好地剔除个体对风险的考虑,测度出更为纯粹的不平等厌恶。

决定双方的收益。该实验只进行一轮,实验收益将以 2 单位筹码兑换成 1 元的兑换比率兑换成现金支付给被试。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方法,采用被试在决策 2 中针对对方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下的返还额作为因变量,以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作为自变量进行 OLS 回归可以计算出被试的互惠偏好系数。

四 实验结果分析

(一) 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在风险偏好测度实验设计中,选项 A 相对于选项 B 被称为安全选项,根据被试选择安全选项的个数可以计算出其风险厌恶系数。表 1 根据 Holt 和 Laury(2002)对风险偏好的分类,列出了风险偏好测度实验中,在各个可能的安全选项选择个数以及相对应的风险厌恶系数和风险偏好类别下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中所占比例情况。图 1 对此进行了描述,图 1(a)表示了在各个可能的安全选项选择个数下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情况,而图 1(b)则进一步列出了在风险偏好测度实验中的每个选择序号下,选择安全选项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情况。从总样本风险偏好的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的个体为风险厌恶的,只有极少部分的个体为风险爱好,风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异质性,风险厌恶者、风险中性者以及风险爱好者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66%、25% 以及 9%,这与 Holt 和 Laury(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而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从男性和女性样本中的个体风险偏好分布情况来看,男性样本中风险中性个体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风险厌恶和风险爱好个体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风险厌恶者、风险中性者以及风险爱好者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63%、31% 以及 6%,而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68%、21% 以及 11%。图 1 更为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点。进一步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风险偏好分布情况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女性和男性的风险偏好分布情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z=0.762, \text{Prob}>|z|=0.446$),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图 1(b)得到很好的说明;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风险偏好均值来看,女性选择安全选项个数均值要稍微高于男性,女性为 5.481,男性为 5.374。对两者的风险偏好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同样发现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text{Pr}(T>t)=0.29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个体的风险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表 1

风险偏好的分布

安全选项的个数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U(x) = x^{1-r}/(1-r)$	风险偏好类别	所占比例		
			男性	女性	总样本
0~1	$r < -0.95$	高度风险爱好	0.00	0.02	0.01
2	$-0.95 < r < -0.49$	非常风险爱好	0.02	0.02	0.02
3	$-0.49 < r < -0.15$	风险爱好	0.04	0.07	0.06
4	$-0.15 < r < 0.15$	风险中性	0.31	0.21	0.25
5	$0.15 < r < 0.41$	轻度风险厌恶	0.16	0.17	0.17
6	$0.41 < r < 0.68$	风险厌恶	0.23	0.24	0.23
7	$0.68 < r < 0.97$	非常风险厌恶	0.17	0.15	0.16
8	$0.97 < r < 1.37$	高度风险厌恶	0.03	0.08	0.06
9~10	$1.37 < r$	完全风险厌恶	0.04	0.04	0.04
选择安全选项个数均值			5.374	5.481	5.441
样本量			(1.547)	(1.752)	(1.675)
			115	189	304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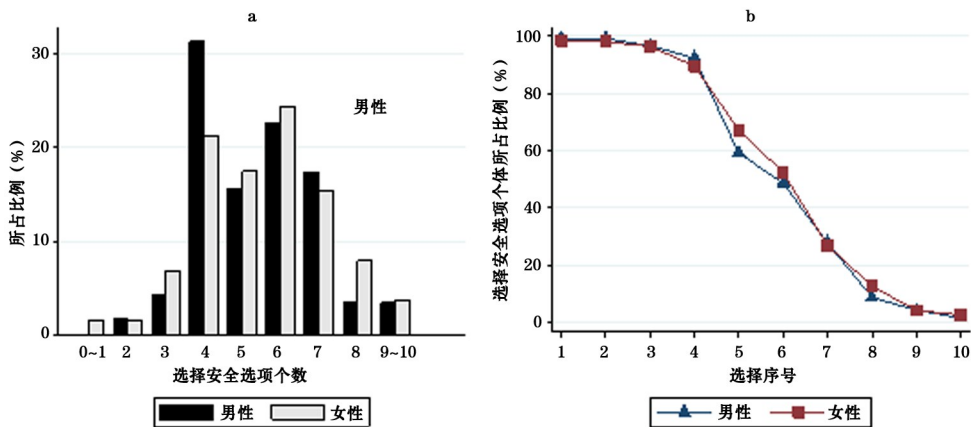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性别个体的风险偏好分布情况^①

为了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采用个体选择安全选项的个数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个体的其他一些客观特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表 2 的回归结果同样

^① 与本文后面分析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时的图形描述不同,风险偏好性别差异的分析中并没有采用累积分布图,这主要是因为风险偏好测度实验的特殊之处和相关文献的分析惯例。相比用累积分布图,采用图 1(b)中的方式来表达要更为直观。

支持了上述分析结论,即个体风险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结论与国外大多数针对西方国家个体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如 Holt 和 Laury(2002)以美国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女性对风险厌恶程度要显著高于男性,但我们对其风险偏好分布数据与本文的数据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两者并无显著差异($z=1.377, Prob>|z|=0.169$),且本文所采用的实验设计与其完全相同,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了文化对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具有影响。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与 Gong 和 Yang(2012)分别针对中国云南母系摩梭和父权制少数民族个体的研究结论不同,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中的个体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回归结果还表明来自于低收入家庭(家庭年总收入低于1万元)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明显较低,而其他个体特征,如是否来自于城市、是否为党员以及年龄等因素对个体风险偏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 2 风险偏好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015	0.205	0.994
年龄	-0.077	0.196	0.694
经济学专业	-0.340	0.242	0.161
汉族	-0.058	0.296	0.846
来自于城市	-0.068	0.230	0.769
党员	-0.077	0.220	0.728
学生干部	0.037	0.211	0.862
家庭总人口数	0.041	0.098	0.673
独生子女	0.273	0.228	0.232
成长于单亲家庭	-0.026	0.064	0.685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0.014	0.198	0.946
低收入家庭(家庭年总收入低于1万元)	-0.585 **	0.232	0.012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0.142	0.205	0.487
父母最高学历	0.087	0.082	0.292
常数项	5.244 ***	0.705	0.000
F(14,290)	0.950		
Prob>F	0.508		
样本量	304		

说明:***、**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标准差。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主要是指最近一年内是否遇到过以下情形中的任何一种:被偷、被人攻击、被诈骗、被诬陷、被抢劫或遭受过家庭暴力。

(二) 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在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分配方案 2 相对于分配方案 1,被称为平均收益方案,根据被试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来计算出被试的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表 3 和图 2 列出了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中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情况,其中图 2(b) 为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累积分布图。从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总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大多数个体为劣势不平等中性者、部分个体为劣势不平等厌恶者,只有极小部分个体为劣势不平等爱好者,劣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者以及爱好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23.03%、68.75% 以及 8.22%。这说明了个体同样具有异质性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但异质性并不是很强,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① 从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

表 3 劣势不平等厌恶分布

劣势不平等厌恶系数	类别	比例		
		男性	女性	总样本
$\alpha > 0$	劣势不平等厌恶	20.00%	24.87%	23.03%
$\alpha = 0$	劣势不平等中性	65.22%	70.90%	68.75%
$\alpha < 0$	劣势不平等爱好	14.78%	4.23%	8.22%
选择平均收益 方案个数均值		2.678 (2.557)	3.048 (2.874)	2.908 (2.760)
样本量		115	189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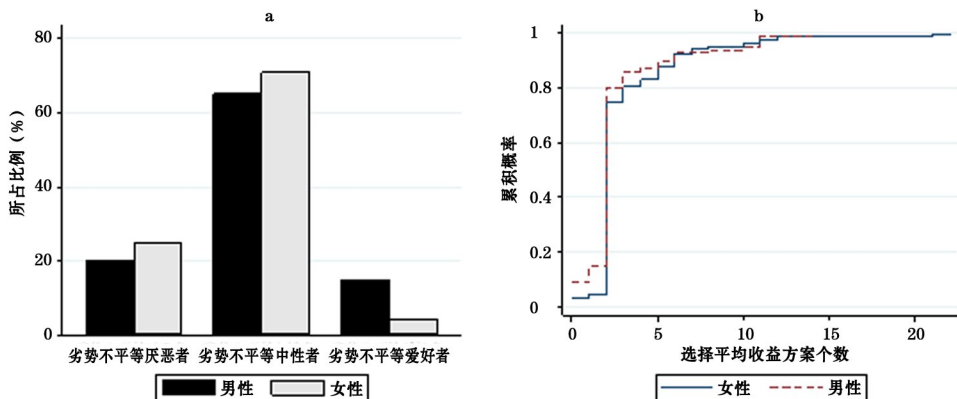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性别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情况

^① 实验中大多数个体都表现出劣势不平等厌恶中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测度的不平等厌恶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感知,更多的是个体愿意为消除不平等付出多大的成本。

偏好的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劣势不平等爱好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而劣势中性者和劣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劣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者以及爱好者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20%、65.22% 以及 14.78%,而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24.87%、70.90% 以及 4.23%,图 2 更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点。进一步对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情况的差异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两者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z=2.210, \text{Prob}>|z|=0.027$);从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均值来看,女性选择平均收益方案均值要高于男性,对两者的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的均值差异并不显著($\text{Pr}(T>t)=0.129$)。

表 4 和图 3 进一步列出了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中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情况,其中图 3(b)为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累积分布图。从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总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个体都为优势不平等厌恶者,较小部分个体为优势不平等中性者,极少数部分个体为优势不平等爱好者,优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者和爱好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62.83%、26.64% 以及 10.53%。这同样说明了个体也具有异质性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且异质性程度要强于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从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情况来看,男性样本中优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而中性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优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者以及爱好者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60.00%、29.57% 以及 10.43%,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64.55%、24.87% 以及 10.58%,图 3 更为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点。进一步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两者的分布并不存在显著差异($z=1.180, \text{Prob}>|z|=0.238$);从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均值来看,女性选择平均收益方案个数的均值要高于男性,对两者的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text{Pr}(T>t)=0.048$)。

上述对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特征性别差异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两者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而对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均值的性别差异分析则发现两者的均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特征的性别差异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两者的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均值的性别差异分析则发现两者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性别对个体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采用个体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其他一些个体的客观特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Tobit 模型回归。同时,考虑到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也将风险偏好作

表 4

优势不平等厌恶分布

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	类别	比例		
		男性	女性	总样本
$\beta > 0$	优势不平等厌恶	60.00%	64.55%	62.83%
$\beta = 0$	优势不平等中性	29.57%	24.87%	26.64%
$\beta < 0$	优势不平等爱好	10.43%	10.58%	10.53%
选择平均收益方案个数均值		6.052(4.950)	7.101(5.825)	6.704(5.526)
样本量		115	189	304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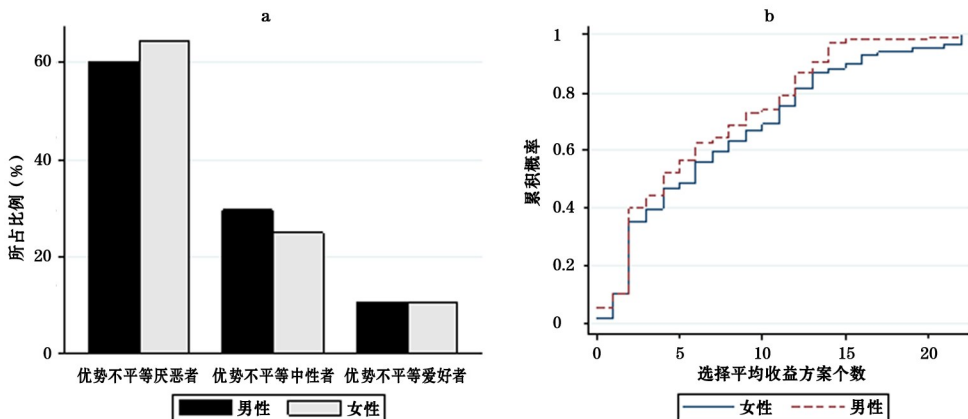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性别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情况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知,性别对个体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存在显著影响,女性要比男性具有更高的优势不平等厌恶。^①同时回归结果还表明,学生干部个体和父母学历越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经济学专业的个体、^②有过不愉快经历

① 由于所使用的研究框架不同,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对不平等厌恶的性别差异程度与国外相关研究中所发现的不平等厌恶的性别差异程度进行数量上的比较,但本文所发现的个体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与国外大多数研究所发现的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厌恶劣势不平等厌恶的结论不一致,如 Solnick (2001) 与 García-Gallego 等 (2012)。

② 对于学习经济学会降低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习经济学专业会让人更像“理性经济人”,我们还进一步对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要高于非经济学专业样本,回归结果还表明,经济学专业与性别因素的交叉项对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优势不平等厌恶,而成长于单亲家庭的个体具有更高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同时我们还发现个体的风险偏好与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风险厌恶程度更高的个体,其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也越高。^①

表 5 不平等厌恶回归结果

自变量	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			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264	0.329	0.423	-1.283 *	0.677	0.059
年龄	0.308	0.379	0.417	0.233	0.614	0.704
经济学专业	0.105	0.398	0.792	-1.837 **	0.759	0.016
汉族	0.333	0.364	0.361	0.391	0.968	0.687
来自于城市	0.378	0.372	0.310	-0.442	0.810	0.586
党员	0.331	0.454	0.466	-0.142	0.813	0.862
学生干部	0.648 *	0.370	0.081	0.571	0.698	0.414
家庭总人口数	0.280	0.177	0.115	0.461	0.293	0.116
独生子女	-0.164	0.386	0.672	-0.181	0.811	0.823
成长于单亲家庭	0.353	0.688	0.609	2.252 *	1.324	0.090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0.270	0.322	0.402	-0.831	0.672	0.217
低收入家庭(家庭总收入 低于 1 万元)	-0.150	0.415	0.718	1.494	1.179	0.206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0.006	0.354	0.987	-1.499 **	0.678	0.028
父母最高学历	0.221 *	0.129	0.088	0.089	0.272	0.745
风险偏好	0.219	0.154	0.156	0.560 **	0.263	0.026
常数项	-1.395	2.102	0.508	2.020	2.818	0.474
F(15,289)	1.020			2.130		
Prob>F	0.434			0.009		
样本量	304			304		

说明:***、**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标准差。

① 这一结论与我们在 2011 年 5 月份以 214 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为被试所测度的风险偏好与优势不平等厌恶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相反,其并没有发现风险偏好与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我们进一步的回归结果还表明,个体性别与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对其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三) 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了带策略性方法的独裁者博弈来研究个体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可以通过被试在作为角色 A 时分配给对方的数额来度量其利他偏好程度。表 6 列出了具有不同类别利他偏好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下所占比例情况。图 4 则进一步用图形的方式对利他偏好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图 4(a)表示了在各个可能的分配额下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情况,而图 4(b)则描述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各个可能的分配额下的个体所占比例的累积分布图。从总样本的利他偏好分布情况来看,个体不仅具有自利偏好,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利他偏好,大部分个体的分配额要大于 0,所占比例为 65.79%,自私者所占比例为 34.21%,分配额占初始总额比例的平均值为 25.82%,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利他偏好分布情况来看,利他偏好类别为自私者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样本中要高于女性样本,而利他偏好类别为中间者和强利他者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样本中要低于女性样本,自私者、中间者以及强利他者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40.00%、35.65% 以及 24.25%,而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30.69%、39.68% 以及 29.63%,图 4 更为直观的说明了这一点。进一步对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利他偏好的分布情况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和男性的利他偏好分布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z = 1.704$, $\text{Prob} > |z| = 0.088$);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利他偏好均值来看,女性的分配额均值要稍高于男性,女性为 2.725,男性为 2.348。对两者的利他偏好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同样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在 10% 水平上显著 ($\text{Pr}(T > t) = 0.08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差异的显著性并不是很强。

表 6 利他偏好分布情况

利他偏好类别	分配额 ^①	所占比例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总样本
自私者	等于 0	40.00%	30.69%	34.21%
中间者	大于 0, 小于 5	35.65%	39.68%	38.15%
强利他者	大于或等于 5	24.35%	29.63%	27.64%
分配额均值		2.348(2.503)	2.725(2.188)	2.582(2.315)
样本量		115	189	304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① 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双方的初始禀赋为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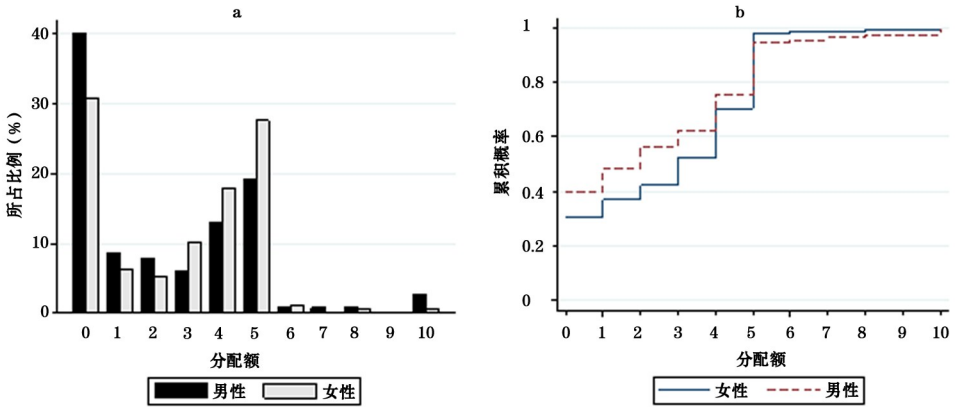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性别个体的利他偏好分布情况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差异的显著性并不是很强。为了对这一结论进行检验,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采用个体的分配额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其他一些个体的客观特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Tobit模型回归。同时,考虑到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也将风险偏好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表7列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对个体利他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即利他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结合着利他偏好性别差异的非参数检验结果和计量回归结果来看,虽然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性别对个体利他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同样与国外大多数针对西方国家个体的研究所发现的女性利他偏好要显著强于男性的结论并不一致,如Dufwenberg和Muren(2006a)、Rigdon等(2009)以及Dreber等(2012)。而且与Gong等(2010)对来自中国云南母系摩梭少数民族个体的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也不同,其研究结果表明母系摩梭男性的利他偏好要强于女性,而与对来自父权制少数民族个体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一致。同时,回归结果还表明具有更高年龄的个体、经济学专业个体以及具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的个体具有更低的利他偏好,风险偏好与利他偏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①

① 对于学习经济学会降低利他偏好的结果同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习经济专业会让人更像“理性经济人”,我们还进一步对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利他偏好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学和非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利他偏好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经济学专业与性别因素的交叉项对个体利他偏好的影响同样不显著。

表 7

利他偏好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371	0.450	0.410
年龄	-0.623 *	0.331	0.061
经济学专业	-1.058 *	0.563	0.061
汉族	-0.440	0.913	0.630
来自于城市	0.416	0.525	0.429
党员	-0.192	0.493	0.698
学生干部	0.153	0.430	0.722
家庭总人口数	-0.001	0.192	0.996
独生子女	-0.343	0.494	0.488
成长于单亲家庭	-0.040	1.100	0.971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0.930 **	0.419	0.027
低收入家庭(家庭总收入低于 1 万元)	1.093	0.675	0.107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0.330	0.411	0.422
父母最高学历	0.039	0.163	0.809
风险偏好	0.088	0.119	0.462
常数项	3.341 **	1.434	0.020
F(15,289)	1.560		
Prob>F	0.083		
样本量	304		

说明:***、**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标准差。

(四)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我们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方法,采用被试在带策略的信任博弈实验中的决策 2 中针对对方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下的返还额作为因变量,以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作为自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可以计算出被试的互惠偏好系数。表 8 列出了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也即具有不同互惠偏好类别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女性样本和总样本所占比例情况。图 5 进一步用图形的方式对个体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图 5(a)为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图 5(b)为互惠偏好的累积分布图。从总样本的互惠偏好分布情况来看,个体的互惠偏好也具有异质性,大部分的个体都为强互惠者,即互惠偏好系数 $r > 1$,互惠偏好类别为强互惠者、中间者和自私者的个体所占比例分别为 65.79%、19.08%和 15.13%,个体的互惠偏好系数均值为 1.219,同样大于 1,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本文采用国内被试所测度的个体互惠偏

好的分布情况与 Altmann 等(2008)以德国个体为被试所测度个体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非常接近。根据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互惠偏好分布情况来看,男性样本中自私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中间者和强互惠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互惠偏好类别为自私者、中间者以及强互惠者的个体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23.48%、13.91% 以及 62.61%,而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10.05%、22.22% 以及 67.72%,这一点可以通过图 5 更为直观地看出。进一步对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的互惠偏好分布情况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和男性互惠偏好的分布并无显著差异($z=1.077, Prob>|z|=0.282$);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互惠偏好均值来看,女性的互惠偏好系数均值要高于男性,女性为 1.274,男性为 1.127,对两者的互惠偏好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r(T>t)=0.031$)。

表 8 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

互惠偏好类别	互惠偏好系数	所占比例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总样本
自私者	$r=0$	23.48%	10.05%	15.13%
中间者	$0<r<=1$	13.91%	22.22%	19.08%
强互惠者	$r>1$	62.61%	67.72%	65.79%
互惠偏好系数均值		1.127(0.734)	1.274(0.617)	1.219(0.666)
样本量		115	189	304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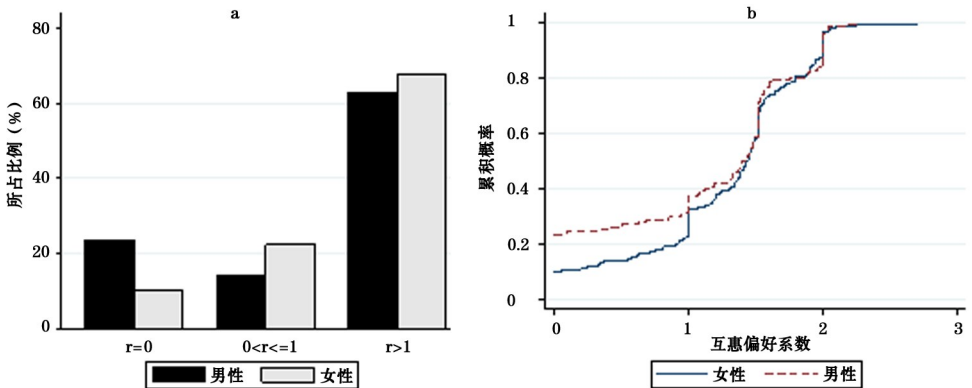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性别个体的互惠偏好分布情况

以上对互惠偏好分布特征性别差异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却表明女性的互惠偏好均值要显著高于男性,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性别对个体互惠偏好的影响。采用个体的互惠偏好系数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其他一些个体的客观特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OLS 模型回归。同时,考虑到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也将风险偏好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9。

表 9 互惠偏好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162 *	0.084	0.054
年龄	-0.173 **	0.069	0.013
经济学专业	0.008	0.100	0.937
汉族	-0.316 **	0.131	0.016
来自于城市	-0.221 **	0.095	0.021
党员	-0.050	0.092	0.587
学生干部	0.118	0.080	0.143
家庭总人口数	-0.003	0.034	0.938
独生子女	-0.074	0.092	0.420
成长于单亲家庭	0.306 **	0.149	0.041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0.119	0.078	0.131
低收入家庭(家庭总收入低于 1 万元)	0.118	0.139	0.398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0.078	0.076	0.307
父母最高学历	0.018	0.033	0.576
风险偏好	0.020	0.024	0.390
常数项	1.931 ***	0.285	0.000
F(15,288)	2.870		
Prob>F	0.000		
样本量	304		

说明:***、**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标准差。

结果表明性别对于个体互惠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女性的互惠偏好要显著高于男性,这一结论与 Croson 和 Buchan(1999)、Buchan 等(2008)、Schwieren 和 Sutter(2008)以及 Heinz 等(2012)的研究结果相同,与 Eckel 和 Wilson(2004a、b)、Cox 和 Deck

(2006)、Bohnet(2007)以及 Bellemare 和 Kröger(2007)的研究结果不同。^① 回归结果还表明,具有更高年龄的个体、来自于城市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互惠偏好,而成长于单亲家庭以及少数民族个体具有更高的互惠偏好,并且风险偏好与互惠偏好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五 结论

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国内个体为被试,在经济学框架下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对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样本中风险中性个体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风险厌恶和风险爱好个体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但个体风险偏好均值和中值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对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对不平等厌恶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样本中劣势不平等爱好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劣势中性者和劣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女性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中值要显著高于男性,但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均值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性别对个体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也不显著;男性样本中优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而中性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中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女性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均值则显著高于男性,性别对于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与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第三,对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利他偏好类别为自私者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样本中要高于女性样本,而利他偏好类别为中间者和强利他者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样本中要低于女性样本,虽然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差异并不显著,性别对个体的利他偏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第四,对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样本中互惠偏好类别为自私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中间者和强互惠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个体的互惠偏好中值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女性的互惠偏好均值要显著高于男性,性别对个体的互惠偏好具有显著影响。

总的来讲,本文以国内个体为被试的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并

^① 由于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对信任博弈中代理人互惠行为的直接研究来试图对个体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但用互惠行为来直接度量个体的互惠偏好实际上并不是很准确,本文在这里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测度方法,在测度个体互惠偏好系数的基础上研究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由于所使用框架不同,我们目前还无法对本文所发现的个体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与国外相关研究中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进行直接比较。

没有发现个体在风险偏好、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以及利他偏好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国外大多数针对西方国家个体研究所发现的显著性别差异的结论不同。^① 本文还发现,中国男性受试者风险中性者居多,过度风险爱好者比例甚至比女性低,但国外的研究一般发现男性会过度自信,进而承担过多的风险,以至带来低回报,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男性降低了家庭投资中的风险。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性别差异在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袁晓燕(2012)的研究表明,源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大跃进时期大幅增加。而且,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相似工作考核和要求使其对子女表现出无差异的教育,进而使得相似的偏好内生于不同的性别之中(袁晓燕,2013)。

同时,我们还对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其他一些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结论。经济学专业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和利他偏好,这说明接受经济学教育可以使个体更具“理性经济人”特征。并且,经济学专业样本中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要高于非经济学专业。此外,低收入家庭的受试者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偏低,说明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体的初始家庭收入状况相关,进一步验证了个体偏好是社会及家庭背景长期内生的结果(袁晓燕,2013)。同时,正如 Banerjee 和 Duflo(2009、2010)的研究所证实的,贫困改变了低收入者的选择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比如说,一个穷人可能无法借贷,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作抵押,而且,由于获得保险的机会有限,他会更加厌恶风险,因为如果很难对冲风险,那么冲击的影响会更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基本都建立在个体偏好同质性的基础上,忽略了个体偏好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本文则通过实验室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有力证据。虽然文化或环境对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具有一定影响,并且本文的研究对以国内个体为被试的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也与国外相关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对比,但本文的研究设计并没有专门针对文化或环境这一因素对个体偏好性别差异程度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本文主要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性别差异的整体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性别与个体其他特征的互动所形成的性别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影响,如性别与年龄的互动,即不同年龄段个体的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是否一致等,未来的研究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进展。

① 一种解释是由于中国的双职工家庭比例比西方社会高,所以性别的社会形象(social image)差别较小。

参考文献:

陈叶烽(2010):《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袁晓燕(2012):《学得更多,干得更多?——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双重负担比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袁晓燕(2013):《重工业优先发展与女性偏好逆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周业安、宋紫峰(2008):《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周业安、左聪颖、连洪泉、陈叶烽、叶航(2012):《具有社会偏好个体的风险厌恶的实验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Altmann, S.; Dohmen, T.; and Wibral, M. “Do the reciprocal trust less?” *Economics letter*, 2008, 99(3), pp. 454–457.

Andreoni, J. “Why Free Ride?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8, 37(3), pp. 291–304.

Andreoni, J. and Miller, J. “Giving According to GARP: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Consistency of Preferences for Altruism.” *Econometrica*, 2002, 70(2), pp. 737–753.

Arano, K.; Parker, C. and Terry, R. “Gender-Based Risk Aversion and Retirement Asset Allocation.” *Economic Inquiry*, 2010, 48(1), pp. 147–155.

Arch, E. C. “Risk-Taking: A Motivational Basis for Sex Differenc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3, 73, pp. 6–11.

Banerjee, Abhijit and Duflo, Ester. “The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09, 1, pp. 1–28.

Banerjee, Abhijit and Duflo, Ester. “Giving Credit where It Is Du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0, 24(3), pp. 61–80

Barber, B. M. and Odean, T. “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1), pp. 261–292.

Bellemare, C. and Kröger, S. “On Representative Social Capita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 51(1), pp. 183–202.

Bernasek, A. and Shwiff, S. “Gender, Risk, and Retir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1, 35(2), pp. 345–356.

Berg, J.; Dickaut, J. and McCabe, K.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95, 10(1), pp. 122–142.

Binswanger, H. P. “Attitudes Toward Risk: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in Rural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0, 62, pp. 395–407.

Blau, F. D. and Kahn, L. M. “Gender Difference in Pa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 pp. 75–99.

Bohnet, I. “Why Women and Men Trust Others,” in Bruno S. Frey and Alois Stutzer eds.,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A Promising New Cross-Disciplinary Field*,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2007, pp. 89–110.

- Bolton, G. E. and Zwick, R. "Anonymity Versus Punishment in Ultimatum Bargaining."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95, 10, pp.95-121.
- Bolton, G. E. and Katok, E. "An Experimental 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neficent Behavior." *Economics Letters*, 1995, 48(3-4), pp.287-292.
- Booth, A. L. and Nolen, P.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Behaviour: Does Nurture Matter?"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2, 122(558), pp.1-33.
- Buchan, N. R.; Croson, R. T. A. and Solnick, S. "Trust and Gender: An Examination of Behavior and Beliefs in the Investment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8, 68(3-4), pp.466-476.
- Byrnes, J. P.; Miller, D. C. and Schafer, W. D.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Taking: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 pp.367-383.
- Cárdenas, J.; Dreber, A.; Essen, E. and Ranehill, 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veness and Risk Taking: Comparing Children in Colombia and Swede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12, 83, pp.11-23.
- Carlsson, F.; Daruvala, D. and Johansson-Stenman, O. "Are People Inequality-Aversion, or Just Risk-Aversion?" *Economica*, 2005, 72(3), pp.375-396.
- Chaudhuri, A. and Gangadharan, L.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7, 73(4), pp.959-985.
- Clark, K. and Sefton, M. "The Sequential Prisoner's Dilemma: Evidence on Reciprocation."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pp.51-68.
- Cox, J. C. and Deck, C. A. "When Are Women More Generous than Men?"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4), pp.587-598.
- Croson, R. and Buchan, N. "Gender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rust Ga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pp.386-391.
- Croson, R. and Gneezy, U.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9, 47, pp.448-474.
- Dannenberg, A.; Riechmann, T.; Sturm, B. and Vogt, C. "Inequity Aversion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in Public Good Game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ZEW) discussion paper, 2007, pp.7-34.
- Dickinson, D. L. and Tiefenthaler, J. "What Is Fair? Experimental Evidenc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2, 69(2), pp.414-428.
- Dreber, A.; Rand, D.; Garcia, J.; Wernerfelt, N.; Lum, J. and Zeckhauser, R. "Dopamine and Risk Preferences in Different Domains." Harvard Universit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0, pp.10-12.
- Dreber, A.; Essen, E. V. and Ranehill, E. "In Bloom: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Among Adolescents." 2012, Available at SSRN 1804278.
- Dufwenberg, M. and Muren, A. "Gender Composition in Team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ation, 2006a, 61(1), pp.50-54.

Dufwenberg, M. and Muren, A. "Generosity, Anonymity, Gender."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6b, 61(1), pp.42-49.

Eckel, C. C. and Grossman, P. J. "Are Women Less Selfish than Men? Evidence from Dictator Experiments."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 pp.726-735.

Eckel, C. C. and Grossman, P. J. "Chivalry and Solidarity in Ultimatum Games." *Economic Inquiry*, 2001, 39, pp. 171-188.

Eckel, C. C. and Grossman, P. J. "Sex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Stereotyping in Attitudes Toward Financial Risk."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2, 23(4), pp.281-295.

Eckel, C. C. and Grossman, P. J. "Men, Women and Risk Avers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Results*, 2008a, pp.1061-1073.

Eckel, C. C. and Grossman, P. J. "Forecasting Risk Attitud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Using Actual and Forecast Gamble Cho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8b, 68, pp.1-17.

Eckel, C. C. and Wilson, R. K. "Whom to Trust? Choice of Partner in a Trust Game." Virginia Polytechnic working paper, 2004a.

Eckel, C. C. and Wilson, R. K. "Conditional Trust: Sex, Race and Facial Expressions in a Trust Game." Virginia Polytechnic working paper, 2004b.

Eriksson, K. and Simpson. "Emotional Reactions to Losing Explai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ering a Risky Lottery."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2010, 5(3), pp.159-163.

Fehr, E. and Schmidt, K. M.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 pp.817-868.

Fischbacher, U. "Z-Tree: Zurich Toolbox for Ready-Made Economic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07, 10(2), pp.171-178.

Frey, B. and Bohnet, I. "Institutions Affect Fairness: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 151(2), pp.286-303.

García-Gallego, A. ; Georgantzis, N. and Jaramillo-Gutiérrez, A. "Gender Differences in Ultimatum Games: Despite Rather Than Due to Risk Attitud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2, 83(1), pp.42-49.

Gneezy, U. ; Leonard, K. L. and List, J. A.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 *Econometrica*, 2009, 77, pp.1637-1664.

Gysler, M. ; Kruse, J. B. and Schubert, R. "Ambiguity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Competence and Confidence Effects."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 2002.

Gong, B. ; Yan, H. and Yang, C.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ctator Experiments: Evidence from the Mosuo and the Yi." 2010, FUDA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Gong, B. and Yang, C.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Attitudes: Field Experiments on Thematrilineal Mosuo

and the Patriarchal Yi."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2, 83(1), pp.59-65.

Harsanyi, J. C. "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5, 63, pp.309-321.

Harris, C. R.; Jenkins, M. and Glaser, D.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Assessment: Why Do Women Take Fewer Risks than Me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2006, 1(1), pp.48-63.

Harbaugh, W. T.; Krause, K. and Vesterlund, L. "Risk Attitudes of Children and Adults: Choices Over Small and Large Probability Gains and Losse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02, 5(1), pp.53-84.

Hartog, J.; Ferrer-i-Carbonell, A. and Jonker, N. "Linking Measured Risk Aversion to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Kyklos*, 2002, 55(1), pp.3-26.

Heinz, M.; Juranek, S. and Rau, H. A. "Do Women Behave More Reciprocally than Men?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al Effort Dictator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2, 83, pp.105-110.

Holt, C. A. and Laury, S. K. "Risk Aver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5), pp.1644-1655.

Lloyd, C. and Beth, T. "The Economics of sex Differenti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37-149.

Moore, E. and Eckel, C. C. "Measuring Ambiguity Avers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Virginia Tech, 2003.

Powell, M. and Ansic, D.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Behaviour in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97, 18, pp.605-628.

Rabin, M. "Incoope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5), pp.1281-1302.

Rigdon, M.; Ishii, K.; Watabe, M. and Kitayama, S. "Minimal Social Cues in the Dictator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9, 30(3), pp.358-367.

Schwieren, C. and Sutter, M. "Trust in Cooperation or Ability?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Gender Differences." *Economics Letters*, 2008, 99(3), pp.494-497.

Schubert, R.; Gysler, M.; Brown, M.; and Brachinger, H. W.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re Women Really More Risk Avers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9, 89, pp.381-385.

Solnick, S.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Ultimatum Game." *Economic Inquiry*, 2001, 39, pp.189-200.

Vickerey, W. "Measuring Marginal Utility by Reactions to Risk." *Econometrica*, 1945, 13, pp.215-236.

Weinberg, J. "Society of Economic Geologists." *Economic Geology*, 2005, 100(2), pp.287-299.

Werner, Steve and Ward, Stephanie, 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mpensation Research: An Eclectic Review."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4, 14(2), pp.129-141.

Zinkhan, G. M. and Karande, K. W. "Cultur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Taking Behavior among American and Spanish Decision Make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1, 131, pp.741-742.

(截稿:2013年4月 责任编辑:王徽)

中国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与劳动力职业分布

宋锦 李实*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概率模型、Oaxaca/Blinder 分解和双差分评估方法考察了户籍对职业机会的影响规模和构成,估计了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对不同户籍劳动力职业分布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户籍一元化改革改善了本地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机会,但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外地劳动力。这使得改革地区内部的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就业壁垒有所减弱,而本地与外地户口之间的壁垒有所加强,可能会影响到改革地区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和规模。

关键词 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 迁移劳动力 职业分布

一 问题的提出

户籍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对经济长期发展和改革的阻碍作用日益凸显。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带来了不同社会人群有差别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且带来了农民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导致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降低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学术界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有基本共识,可是在理

* 宋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室 电子邮箱:songjin@cass.org.cn;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文章提出的详细建议和意见。本文的初稿于 2013 年 1 月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内报告,作者对于报告会上钟笑寒和邢春冰等与会专家提出的建议深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本文部分受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重点课题“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劳动力迁移”的资助。